

GUIYANGWENSHIZILIAOXUANCUI (下册)

贵阳文史资料选萃

贵阳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编

贵州人民出版社

贵阳文史资料选萃

政治军事卷(第二部分)

贵阳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编



贵州人民出版社

目 录

(下册)

政治军事卷(第二部分)

蒋介石势力的人黔与王家烈政权的垮台	顾大全(885)
我在贵阳的三次警护工作	卓建安(895)
吴鼎昌主黔时期的特种会报	滕云栋(903)
谷正伦与国民党宪兵	卓建安(915)
军统息烽特训班始末	毕 骥(934)
在何应钦的参谋总长办公室三年	陈廷镇(957)
谷正伦在贵州的最后岁月	刘宝贤(973)
记白崇禧最后一次来贵阳布防	余文炯(983)
原贵阳县见闻琐录	李大光(985)
解放前贵阳历任县、市长异动情况	何静梧搜集整理(1009)
解放前贵阳省会警察局概况	雷毓灵(1012)
解放前的贵阳地方法院	刘鸿烈(1015)
一四〇师参加台儿庄战役前后	李祖明(1021)
一〇二师抗日作战纪实	刘铁轮(10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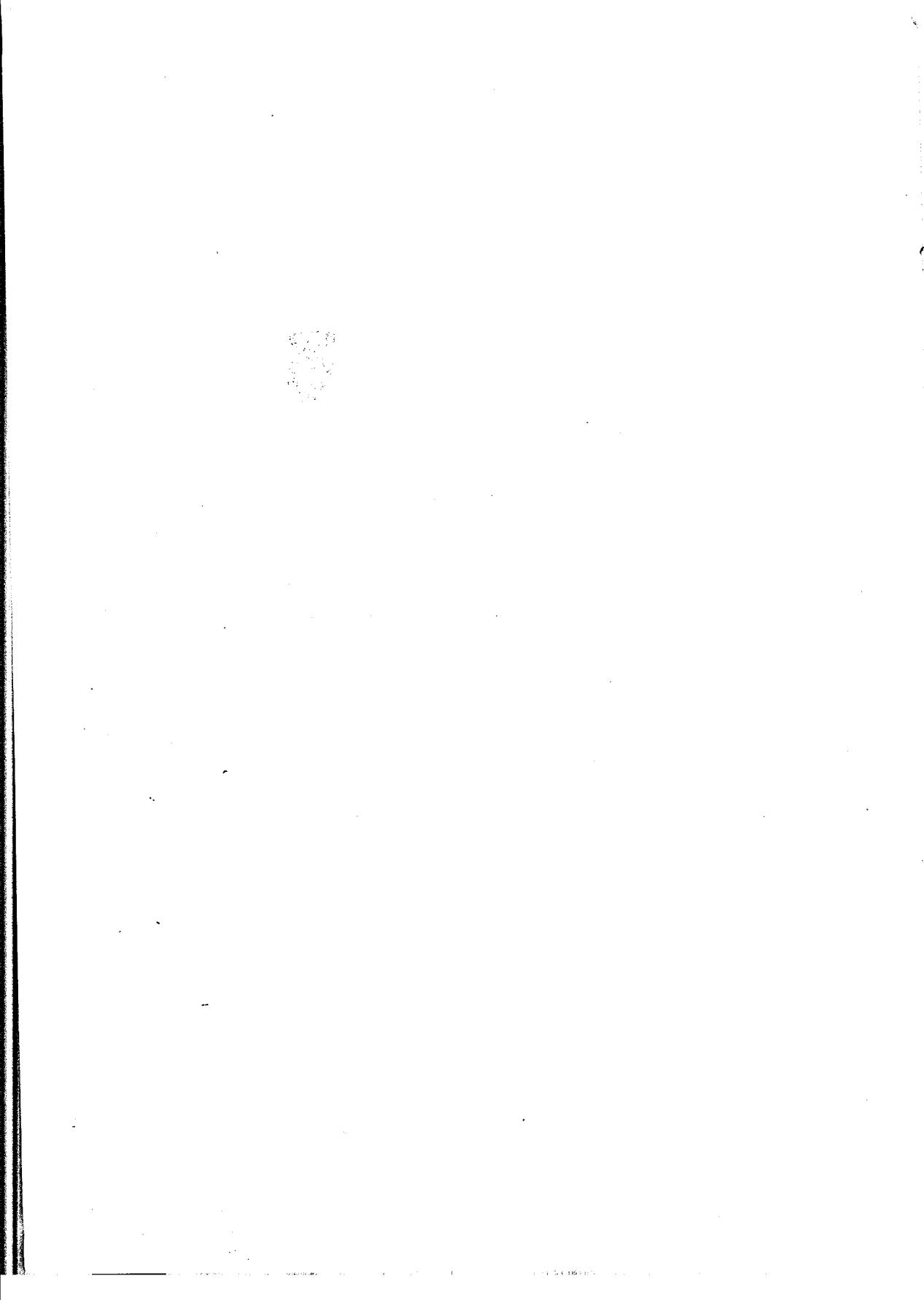
- 参加抗日战争的回顾 王伯勋(1051)
我所知道的贵州参加抗战各师概况 牟龙光(1057)
新编第八师抗战亲历记 熊先煜(1071)
贵阳“二四”空袭亲历记 李大光(1079)
一〇三师在滇西攻击松山日寇的回忆 陈一匡(1089)
张学良将军被囚琐记 邱秀虎(1099)
张学良将军患阑尾炎住院治疗经过 程本礼(1120)
杨虎城将军在玄天洞 罗礼贤 古乾洁(1123)
飞虎将军陈纳德 杜云峰编译(1128)
八年抗战时期的回忆 萧醒球(1134)
“五四”运动与贵阳 叶江华 杨 青(1138)
红九军团在贵州的征战历程 张 薇(1143)
回忆地下党贵阳县工委的一些活动 谢凡生(1153)
抗战期间八路军贵阳交通站 龚大明(1158)
回忆与希望 姚重华(1163)
进军贵州和接管贵阳记事 秦天真(1171)
回顾贵阳解放时的盛况 张 垠(1182)
回忆贵筑县工作的片断 王 枫(1186)
抗美援朝时期贵阳人民的支前运动 王毅力(1193)
忆贵阳市首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萧 岗(1200)
忆筑城首次国庆阅兵游行盛况 傅金声(1209)
解放初期南明区工作概况 张建民(1214)
解放初期公安派出所工作的回忆 程伯欣(1222)
统战工作的几件事 张开生(1227)
解放初期的妇女统战工作 吴荣坦 黄 敏(1238)
参加西南各民族庆祝国庆代表团的回忆片断 李儒云(1243)
贵州省中苏友协与保卫世界和平分会概述 袁化鹏(1250)



对市政协初期几人委员的回忆	邓见宽(1255)
六十年代在市政协工作的回忆	朱崇演(1261)
转折时期的回忆	吴志刚(1268)
贵阳百货联营公司的社会主义改造概况	李守明(1276)
东风人民公社成立经过	邵德龙 李毅(1286)
李大钊与贵阳人李仲公	李芳(1292)
周恩来与谌志笃的友谊	张敏(1296)
朱德与卢焘	周本渊(1301)
邓小平视察花溪农村工作	徐开新(1304)
周恩来在花溪	卢义生 张文俊 杨鹏声(1307)
贺龙视察青岩	周天胜(1313)
胡锦涛在董家堰植树记	张敏(1317)
我为汪乃贵将军代写回忆文章	彭远福(1320)
呕心沥血为筑城	单启贤 柴龙 刘超(1330)
我与素园老人相处七年见闻录	杨锡寿(1336)
先父贺培真事略	贺士恒 贺士宏(1348)
外祖母口述铁闻	王守瑜口述 李光斗整理(1353)
解放前的经历	张彭年(1356)
后记	(1372)



政治军事卷
（第二部分）





蒋介石势力的人黔与王家烈政权的垮台

顾大全

885

—

贵州地处西南战略中心，控制了黔省，东可窥湘，西可挟滇，北扼四川，南制广西。尤其可改变黔省鸦片由桂出口的通道，从而切断广西重要财源，从经济上扼杀桂系。所以，蒋介石夺取贵州之心，由来已久。

早在 1928 年，蒋介石对周西成不让国民党势力进入贵州十分愤慨，支持驻鄂西的国民革命军第 42 军军长李燊，向周西成争夺贵州统治权。是年 8 月，蒋介石与何应钦给李燊密电，支持他打回贵州。年底李、周在黔东激战，李败退云南。1929 年，在蒋介石的授意下，李燊得到云南龙云的支持，组成龙、李联军，再次与周西成在黔西以西地区激战。同年 5 月，周西成战死镇宁，李燊攻入贵阳取得了短暂的统治。后因云南内讧，龙云撤回滇军，李燊势孤，以副军长毛光翔为首的桐梓系集团反攻贵阳，李燊无力固守，又败走云南，政权才落入毛光翔手

里。因毛光翔是周西成的死党,蒋介石又改变策略,扶持有个人野心的副军长王家烈搞垮毛光翔,于1932年夺取了对贵州的统治。

王家烈(1893—1966)字绍武,桐梓人。1914年入伍,曾参加护国,护法之役,历任排、连、营、团、旅长。1926年6月,周西成出任贵州省长和25军军长后,王被提为师长。1932年2月,王家烈在蒋介石和何应钦的支持下,用武力把毛光翔赶下台,担任了25军军长和省主席。王上台后,对南京政府“唯命是从”,但为了自保和割据的需要,仍与独立性较强的两广联系,最初只限于信使往来,后因购运枪械并与两广联营销售烟土,发展到与广东陈济棠、广西李宗仁的政治结盟,于1934年成立了“三省互助同盟”。蒋介石为了使其势力进入贵州,派宋思一到贵阳筹办中央军官学校贵州分校,由于李宗仁、白崇禧的反对,王家烈不得不拒绝了蒋介石的办校活动。在蒋看来,过去花费三年功夫培植起来的王家烈,如今并不跟着他走,促使蒋从扶持转变为拆台,必欲搞掉王而后快。

自民国以来,西南军阀就是一批大大小小的“土皇帝”,进行割据,对国民党政权处于半独立状态。蒋介石为了统一西南,利用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和红二、六军团在湘鄂川黔边的活动,用西南军阀的力量与红军厮杀,造成两败俱伤,既可消除红军这个“心腹之患”,又可以剪除地方势力,一箭双雕。但西南军阀也很清楚蒋的意图,他们一方面害怕红军入境而动摇自己的统治,一面也怕蒋系势力趁机而入,故采取了“保境守土”,“驱逐为止”的对策。蒋介石对这种送客式的追击,敲梆式的防堵很气愤,大骂他们“借冠自重”,但亦无可奈何。中央红军入黔给蒋势力打入贵州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亦为解决西南找到了突破口。

贵州自王家烈当政后,统治集团间内部矛盾重重,拥兵自重,各自独霸一方。王家烈的势力范围,仅及黔中主要地区,其他地区无力控制。如副军长侯之担兼教导师师长,有6个团兵力,兼摄川南边防军

司令,割据黔北及川南;第三师师长蒋在珍有4个团,割据黔东正安、沿河;师长犹国才有6个团,割据黔西南盘江八属。他们名义上拥王家烈为军长,实际上不听他的指挥,不过是“文书上的隶属”关系。25军号称5个师,实际上王家烈只能控制柏辉章、何知重两个(第一、二)师。各师亦各有政治背景和靠山,侯之担投靠刘湘,犹国才得到龙云支持,蒋在珍与何健、陈渠珍勾结,黔军内部四分五裂,事权不能归一,王家烈与犹国才因争夺权力还兵戎相见。黔系军阀在西南军阀中较为衰弱,亦是蒋介石较易剪除黔系的原因。正如蒋介石对陈布雷所说:“此乃政治上最好的机会,今后只要我们军事、政治、人事,经济调配适宜,必可能造成统一的局面。”

1934年12月中央红军入黔期间,蒋介石令薛岳率周浑元、吴奇伟两个纵队8个师的“中央军”入黔追剿红军。当时,王家烈为了保住地盘,配合蒋军在黔东南堵截,令黔军周芳仁旅及民团在黎平、锦屏布置清水江防线,阻挡红军入黔,扬言“逐红军于黔境百里之外”。黔军毕竟不堪一击,黎锦防线很快崩溃,红军进占黎平,锦屏。红军入黔后,蒋介石急忙改变兵力部署,命何键的湘军陈光中师赵梦炎旅由黎进驻剑河,王东原师驻锦屏、远口一带,章亮基、陶广两个师向沅陵疾进,李云杰向会同族进;命薛岳兵团吴奇伟纵队由芷江经便水、玉屏入黔,令其在12月27日抵达镇远;令周浑元纵队经黔阳入天柱,于12月28日抵达三穗。同时,还命令王家烈率黔军在黔东严加防堵。此外,还令桂军、川军向黔南,黔北运动。

“中央军”的入黔,引起了王家烈的不安,他自知力量单薄,于是恳请盟友两广派兵支援,牵制“中央军”。李宗仁,陈济棠为了执行“三省互助同盟”,拟计划由两广编组联军,借追剿红军之机,抢先进入贵阳,控制贵州,不致使贵州省落入蒋介石之手。1934年2月12日李宗仁致白崇禧电中明确说:“黔局关系重大,决乘追共机会,与粤联军入黔,已与伯南(济棠)联电五中全会请缨。”不料这封电报发出后,被蒋介

石的耳目获悉并报告了蒋，故密令薛岳率部进入贵州后，抢先拿下贵阳。

当时，王家烈与蒋介石的关系出现了复杂的局面，既互相利用，又为争夺贵州控制权而倾轧。为了保住贵州地盘，出于反共的需要，王家烈等军阀间也暂息干戈，联合起来对付红军。王家烈与侯之担、犹国才制定了黔军的布防计划：确定乌江以南防务由犹国才部负责，犹任东路左翼指挥，率3个团及特科两个营布防于福泉、瓮安一线，乌江以北江防全线，由侯之担部负责，侯还兼“贵州剿匪后备总指挥”，王家烈亲率两个师负责东路右翼，开阳至贵阳一线，相机向前推进。此时，由于蒋桂矛盾，薛岳遵蒋令防桂军抢占贵阳，利用黔军去防守乌江河防，贵阳兵力空虚，便撇开红军，径往贵阳，抢先占了王家烈的统治中枢。当时薛岳兴高采烈地对吴奇伟说：“我们现在入了半个广西了”。他这话是指桂系财源收入有一半是靠运贵州鸦片而得的税收，因贵州的烟土经广西外运，控制了贵州，等于控制了广西的一半财源。例如1932年，据《广西年鉴》记载，该年广西省库收入1700余万元，而烟赌税占1300多万元，而烟税又居绝大部分。接着，蒋介石就任命薛岳为贵州绥靖主任，郭思演为贵阳警备司令。由于敌人内部矛盾，1935年元月初，中央红军发动了乌江战役，仅几天时间，突破了侯之担的乌江防线，抢渡乌江，进占遵义，为召开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提供了可贵的时间。

王家烈丢失了省行政权，进出贵阳受到蒋军的盘查和限制，对蒋极为不满，大骂“中央军”比对待殖民地还恶劣。他为了求安身之地，被迫倾全力图黔北与红军作战。中央红军于2月18~20日，二渡赤水河，回师黔北，进行了娄山关、遵义战役，黔军遭到惨败。红军歼敌8个团，还在遵义至乌江边歼灭吴奇伟部两个师，黔军主力受到沉重打击，实力大大削弱，再也不敢与红军正面交锋，只得龟缩到金沙，黔西一隅。王家烈曾设想，倘若黔北不可保，退而到川、黔、滇三省边区，乞

求川、滇当局划块地盘，以求生存。

当红军还在贵州转战期间，由于情势紧张，蒋介石还不能立即把王家烈赶下台，一方面是还可利用王家烈手里的几个团的兵力对付红军，另一方面，西南军阀对蒋介石也有一定的牵制，不便突然下手。由于薛岳首先抢占了贵阳，两广并不甘心，1935年1月11日，陈济棠，李宗仁和白崇禧联电国民党中央，表示由两广抽调劲旅，编组追剿部队，继续追剿。随即派出3个师的粤军由军长张达率领向西江推进。同时，两广还联请李宗仁，白崇禧担任援黔追剿军总，副司令，夏威、廖磊等奉令率桂军进入黔南独山，都匀，其前锋抵达离贵阳不远的马场坪，粤军亦进抵柳州策应。薛岳见势不妙，急电白崇禧制止桂军继续前进，并在贵阳城郊加强警戒，严密防范桂军行动。此时，川、滇军阀见王家烈处境狼狈，同病相怜，也给王一些援助，每月给王10万川钞。他们企图把红军消灭于黔境，以免蒋介石有人境之借口。

红军遵义大捷，蒋介石怒斥王家烈作战不力，丢失桐梓。遵义，使蒋军受到惨重损失，有失土纵敌之罪，而王家烈在反共中又输掉了老本，不再具有使用价值，赶王下台的时机成熟。3月15日，国民党中央常委（原国民政府驻贵州特派专员）李仲公奉令约在黔西的王家烈到贵阳面叙。李对王说：“蒋先生征询你的意见，希望你对贵州的政治和军事专搞一样，你愿主军还是主政？”王鉴于政权已经丢失，被迫答道：“政治非我所长，我愿专搞军事。”蒋又派卸职的原武汉绥靖主任兼湖北省主席何成浚，由渝赴黔与王商谈贵州局势，目的是进一步落实王家烈弃政主军的保证，王仍表示弃政主军。但是，王家烈与何谈后，从贵阳回到黔西，听了部下进言，“军政两权，得之不易，万不轻弃”，遂对弃政主军诺言置之一边，不向蒋答复。

3月21至22日，红军四渡赤水河，把敌军全部抛在赤水河西岸及其以西地区。接着，红军神速南下，与敌军相背而行，进至遵义、仁怀大道北侧地区，巧妙地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3月24日，蒋介石扬言

“督剿”红军，偕宋美龄由重庆飞抵贵阳，随行的还有顾问端纳、陈诚、晏道刚等高级幕僚。蒋除了“督剿”红军之外，亦为了解决王家烈的政权问题。

此时，川军在黔西同黔军因住房问题发生冲突，蒋介石闻知，借调查为名，派侍从室主任晏道刚到黔西，大方调查。晏为了执行赶王下台的方针，对王的两个师长何知重、柏辉章进行封官许愿，许诺两师改编为中央直辖师，取消军一级，领十足军饷，不再受军长克扣，同时还答应给何、柏各5万和3万大洋。何、柏在蒋的重金收买下，支持倒王。随后，晏向王再次传达了蒋的意图。王以“军长不兼主席就军费无着，主席不兼军长就无有保障”为由，表示两职都不愿放弃，晏警告王：“你想两者都不丢，恐怕两者都不保。”王借口要同两师长商量，意在求援。王不知何、柏二人已被收买，找他们商谈时不但得不到支持，反而软攻硬逼，唆使部下包围军部闹饷，公然提出要王下台。王无可奈何，只得表示接受弃政主军，随即同晏到贵阳向蒋介石面辞省主席一职。4月6日，王家烈在黔西正式向蒋发出辞省主席电，说什么“窃承乏黔政，于兹三载，德薄能浅，建树毫无……只有恳请辞去省主席兼职，另请钧座简派贤能”。同日，王又电何成浚，李仲公剖白苦衷，请求在蒋面前婉释。4月7日，何、李回电，赞王“践诺履信”，作了“智”的选择。

4月9日，蒋介石任命李仲公为贵州省临时行政特派员，暂管省政。同时，给了王家烈一个第二路军追剿总指挥的空头衔，但又令王将所辖两师五旅15个团改编为国民党中央直属的两个师，每师各编3个团，旅的建制废除。这也是逼王交出军权的又一措施。王家烈接令后，为了保存一点余力，遵令照办，拟在黔西、大方集中部队进行整编。蒋为了逼王交出军权，从中梗阻，不让部队集中。部队不集中，人事不好安排，整编不能实现。蒋以部队未整编则不发伙饷，从经济上加以扼制，使王处于“一日无粮千兵散”的危险边缘。蒋还指使何知重、柏

辉章出面劝王交出军权，否则部队将哗变。王在内外夹击下，进退维谷，回天无术，知大势已去，无法恋栈了。4月底又即在报上公布免去王第二路追剿军总指挥及25军军长职务，改命他为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

王家烈交出军政大权后，蒋对他仍不放心。此时，红军已西征入滇，黔境“剿共”战争亦暂告一段落，滇、桂军也奉命令回防，决定把王赶出贵州。5月3日，张学良来筑汇报湘鄂川黔“剿共”战事后返武汉，蒋令王家烈随张同机飞赴武汉，后送入陆军大学高级班学习。从此，王家烈结束了军阀的政治生涯。桐梓系的其他重要人物，毛光翔寓居赤水，蒋派人暗中监视，侯之担因“剿匪”不力，被撤职查办，禁闭重庆。桐梓系对贵州为期十年的统治，宣告结束。

王家烈被赶下台后，蒋介石立即改组了省政府。4月17日，蒋介石通过行政院发表了贵州省府委员兼主席王家烈请求辞职，任命吴忠信为贵州省府委员兼省主席的决议。蒋为什么任命吴忠信任省主席而不任命薛岳呢？因蒋去王，引起了桂系的反感和愤怒，蒋知吴与李宗仁、白崇禧有交情，所以启用吴缓和与桂系的矛盾。4月29日，南京政府又下令免除犹国才（兼民政厅长）、郑先辛（兼财政厅长）、谭星阁（兼教育厅长）、刘民杰（兼建设厅长），黄道彬，窦觉苍、侯之担，李锡祺等省府委员及兼职；并任命曹经沅、李仲公、叶元龙、谌湛溪、王澄莹、牟琳，周恭寿、朱庭祜等为省府委员，曹经沅兼省府民政厅长、叶元龙兼教育厅长、谌湛溪兼建设厅长。次日，又免除了王家烈的省府秘书长万稚新之职，在半个月内，把王氏旧班底来了个大换班。5月1日，在蒋介石主持下，吴忠信及省府委员宣誓就职，国民党在贵州的政权正式建立起来。随后在全省设11个行政督察专员区，分管各县，并委任了专员和县长。

在改组省政府机构的同时，亦改组了国民党贵州省党部，国民党中央委派李次温任省党部特派员，为了加强党务活动，设有以袁慕莘



为书记的“设计委员会”，发展国民党在贵州的力量；为了摧残革命势力，训练特工人员，增设特务室，以牟希禹为主任，除受国民党省党部领导外，还直接受“中统”特务组织的领导，诱骗青年学生参加，进行特务训练。接着，“军统”特务组织也在贵州建立，在城乡执行所谓“绥靖计划”，加强独裁统治。“绥靖计划”的主要内容有：一、清剿散“匪”；二、构筑碉堡；三、完成交通；四、举办清乡；五、清查武器；六、组织“民众”；七、编行保甲等。在“净化”国统区的名义下，对人民乱捕滥杀，强化反动统治。

与此同时，对黔军进行改编，王家烈直属的两个师分别在毕节、安顺改编为中央直辖的102师（柏辉章任师长）和103师（何知重任师长），废旅，每师辖3个团，犹国才师在兴义编为121师，由原参谋长吴剑平出任师长，犹国才调任军政部驻西安办事处主任，借此羁縻；第三师蒋在珍部在湄潭编为新8师，蒋仍任师长，副军长侯之担直属的教导师在赤水改编为新25师（后改为140师），由薛岳部59师副师长沈久成充任师长。在改编黔军时，周芳仁旅长带第七团，江荣华副旅长带第一团，抗拒改编，把两团拖向广西，投奔桂系，被李宗仁，白崇禧收编。其他旅、团长大部裁淘，解甲归里。改编后的5个师隶属军政部，饷械由军政部调拨。从此，以25军为番号的黔军地方部队瓦解了。1935年6月以后，蒋介石又将这五个师陆续调离贵州，分散驻防于省外。自民国元年以来，黔系军阀割据之局是终，贵州开始了新军阀的统治。

—

蒋介石借追剿红军夺取贵州政权，对西南各省军阀的政治动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对蒋介石的离心倾向更加严重。三省同盟的垮台，

又断绝了广西运销烟土的财源,因而使两广对蒋极为愤慨。由于矛盾的加深,两广利用全国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形势,于1936年6月1日发动了“两广事变”,名义上是逼请国民党中央抗日,实际上是为了自己图存而进行的反蒋活动。

云南为了防备蒋氏故伎重演,当中央红军入滇后,龙云只准蒋军过境,坚拒薛岳率队进入昆明,沿途严密监视蒋军行动,并飞调滇军回防,使蒋氏不敢突然下手。四川军阀为了保存实力,大多尽力避免与红军发生正面冲突。由于蒋介石与地方军阀的矛盾,结果是追者不敢猛追,堵者不敢强堵,为红军长征的胜利提供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缺口”。

王家烈的垮台对贵州政局也发生了深刻的影响,首先,它致命地打击了以桐梓系军阀为代表的统治阶层,他们为恢复失去的政权,痛感“亡省之痛”,试图武装反抗,王家烈夫人万淑芬曾邀请部分黔军高级军官歃血为盟,誓约反蒋,广西亦曾派代表赴密会,并允诺筹10万元作军需,还计划组织新军,从滇、湘、桂三省取得援助,并分三路进行活动。

后因蒋与桂、滇矛盾的缓和,这一计划未能实现。其次,由于蒋大量裁淘黔军,使大批中下级军官和士兵失去生活保障,开展了反蒋政权活动。其中比较大的有三支力量:以黔军独立旅旅长曹天全为首的“贵州自治军”发表宣言,宣称“打倒黔省黑暗政府,驱逐驻黔劣军,解除黔民痛苦”;以黔军第三旅旅长犹禹九为首,在黔西北组织了新25军,提出“雪亡省之耻”,“黔人治黔”的口号,仍拥王家烈为军长,进行“复兴25军”的运动,以黔军第二师参谋长穆守先为总指挥的“贵州省民众自卫团”,提出“打倒不能保护我们,反而把我们当作牛马奴隶”的政府,宣称“自卫图存,自卫卫人”等口号,进行反蒋活动。

贵州是一个经济贫困,文化落后的省区,人民长期在军阀苛政,兵燹,鸦片三害之下挣扎,孕育着强大的反抗斗争潜流。这一时期,也正

是中央红军红二六军团在贵州活动期间。红军的足迹遍及全省 67 个县(市),进占 35 座县城,播下了革命火种,人民为了争生存和解放,反蒋抗日游击队广泛建立。这样,人民起义与编余黔军的反蒋活动交织在一起,形成了整个贵州社会的大动荡,大分化的局势,为中共贵州省工委党组织的发展和领导全省抗日救亡运动有了深厚的社会基础。